

雷鳴遠神父與中國教會

彭家怡

「願天主受讚美！痛苦的浪濤雖然多次洶湧，似乎要擊碎我的心，但在聖心的垂視下，我常保持平靜和喜樂，因為祂是信實的……為了我們的中國，為了極可愛的中國民眾，我奉獻一切，希望天主使中國皈依。我們或生或死，我們屬於上主。」

（《雷鳴遠神父書信集》，140頁）

1. 前言

現今生活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的我們，談到地方教會，談到教會本地化，必然會聯想到基本條件必須擁有本地神職，包括神父和主教，才能建設地方教會，推進教會本地化，可是如果我們能明瞭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教區及世界各傳教區的情況，便不得不承認推進教會本地化，是非常艱苦而偉大的工作。在近代中國天主教會史上，雷鳴遠神父被喻為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偉大先驅，在教會本地化的發展中有著決定性的貢獻。雷神父時代的天主教會，可說是一個移植到中國的歐美式教會，幸有他的先見之明和奮鬥不懈，配合各方努力，促使中國教會逐漸脫去外國的形象，走向本地化的正軌。他以言以行向中國人傳揚福音，為愛中國人奉獻一切，並忍受各樣痛苦，目的為使中國人皈依基督。

2. 生平簡介

雷鳴遠神父原名腓特烈·雷博(Frederic Lebbe)，在1877年八月十九日生於比利時岡城一公教家庭。他在1889年預備初領聖體時，就想成爲一位傳教士，十八歲加入遣使會。在1899年義和團引起八國聯軍以後幾個月，北京宗座代牧樊國樑主教(Mgr. Favier)到了羅馬，指定他到中國傳教。1901年雷鳴遠乘船到大沽口，進入天津，轉到北京，從此成了中國的傳教士，開始他在中國的三十九年傳教生活。由1902年至1919年間，曾分別於涿州、天津及紹興等教區出任總鐸。其中於1915年在天津總鐸任內，因老西開事件，替中國人爭取主權，被法籍主教調往正定，任何家村本堂副主任，次年又被調往浙江嘉興，他的傳記上稱這些調動爲充軍。1920年被調往巴黎，照顧中國留學生。直到1927年，中國第一批國籍主教在羅馬受祝聖後回中國，雷神父才能回來，在安國教區工作，他改變國籍，入中國籍，任高家庄總鐸。中日戰爭爆發，他組織救護隊協助救援工作。1940年六月二十四日逝世。

3. 時代背景

雷鳴遠神父在中國福傳的歲月裡，整個世界正處於戰亂和動盪中。當時的中國正面臨幾個大問題，這些問題成了中國人歸依基督的嚴重障礙：腐敗的滿清統制遺留下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如農村凋零與吏制敗壞，使全國民不聊生。歐美列強欺凌中國，訂定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普遍產生仇外排外情緒，不平等條約如自由傳教條款，使中國人民連外來宗教一併排斥。在教會內，外國傳教士很多有種族及文化優越感，使中國人民對福傳工作產生誤解：在中國建立教會就是建立精神文化殖民地，而傳教士被以爲是外國政府侵略中國的工具。中國既要面對內亂，同時還承受列強瓜分的壓力，尤其日本侵略

中國的危機。中國知識份子雖正謀求中國現代化，但是歐美本身都處於反宗教、反聖職、俗化的過程中，能夠提供給中國的，只是唯物主義、無神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國家主義等，使中國思想界陷於混亂和空虛中。

雷神父處身於這種情況下，建立其「中國教會觀」。他提出基督的福音真理超乎一切東西，傳教士應尊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要跟中國人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屬於中國人的教會，如基督的教會在歐美而有歐美的特色。此外，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列強政權威脅下，提倡中國人該愛國，幫助中國人培育自尊心和信心，去建設自己的國家和教會。傳教士應追隨聖保祿的典範：跟中國人成為中國人。雷神父努力地以實際行動為中國人服務，希望中國人民從天主教教友行動中，看清基督教會的真面貌，基督的教會是一個真正能屬於中國人的教會。

4. 對中國教會本地化的貢獻

在促進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工作上，雷鳴遠神父努力中國主教的祝聖，華籍教區的成立，也注意到教會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認真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歷史文化，積極參加公益活動、演講，使福音的教化力量發揮到社會上。他重視大眾傳播工具，特別創辦報刊，以教會立場提倡中國人愛國，進而改變教會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其中以《益世報》最廣受好評。此外，雷神父更創辦中國修會及組織教友團體，為教會本地化給予保證和實力。

4.1 促成國籍主教的誕生

從十六世紀利瑪竇進入中國，到二十世紀，中國各教區的主教都是外國籍的修會會士。傳教士的工作集中在照顧教友，和訓練傳道員上。所有中國國籍的神父，所受的教育都是拉丁文教育。他們都視為協助傳教的人員，位居外籍傳教士下，沒有一位國籍神父在管理教會上擔任重要職位。加上上述的環境因素，天主教會可說仍滯留在播種期，尚未在中國根深蒂固。

為使教會在中國茁壯成長，雷神父主張：「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實現這主張的具體辦法，他認為最重要，最徹底的是建立「完整的本地神職」，而所謂本地神職，不僅是輔助外國主教的中國神父，而是指祝聖國籍主教，來領導中國教會。其次是取消「保教權」，使中國教會不受西方政府的干預，而直接由教廷來管理，以消除列強利用教會作政治敲詐。

其實，遠於1622年羅馬教廷成立傳信部，目的就是為建立本地聖職，在1659年傳信部給遠東教會頒發的文件中，明顯表示對於在傳教區祝聖本地主教的期望。及後在教宗額我略十六世（1831-1846年）和良十三世（1878-1903年）的文獻中，亦提出有關指示。直至1919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本篤十五世頒佈《夫至大至聖之任務》通諭，釐定新的傳教方向，肯定外籍傳教士的功績，奠定了傳教區的教會基礎。但是要在基礎上建立本地的教會，由本地聖職人員作主人，這是天主教會的傳統禮制。

雷鳴遠神父的主張受到許多傳教士，尤其同會會士的反對，他本人也受到排擠。他於1917年由嘉興被調職到紹興之前的退省中，給當時中國主教之長趙保祿主教一封長信，答辯各方的控告，信中將他對

「中國歸中國人」的思想，及對「建立中國本地聖職」詳細地陳述。關於國籍聖職人員，他堅決說明傳教區最迫切的工作，是預備成立國籍教區，由中國主教管理，主要的理由並非是「羅馬的指示」或「傳教士減少」，而是「只有本地聖職才能瞭解、深入並歸化他本民族的靈魂」。

趙主教十分同情雷神父的處境，也支持他的主張，但是對雷神父只作了口頭答覆，並未有實行雷神父信中所建議的。這封信的副本，後來由雷神父的好友湯作霖神父(Fr. Antoine Cotta)重寫成一份六十六頁的備忘錄寄給羅馬傳信部，這也引起羅馬的注意，對日後雷神父被邀赴羅馬起了積極作用。

教宗庇護十一世在 1922 年派剛恆毅總主教任駐華第一任宗座代表，他抵華後，積極籌備成立國籍教區，委任成和德和孫德禎兩位國籍司鐸為兩個教區的監牧，又於 1924 年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傳教史上第一次全國教務會議，根據教廷的指示，討論各教區應共同遵守的綱要，並規定本地神職人員可擔任任何職務，包括主教。另一邊廂，雷神父雖被調返歐洲，卻造就了機會讓他親身向教廷陳述有關中國教務的種種。在 1920 年十二月因比國麥西耶(Card. Merciel)樞機的推介，到羅馬拜謁教宗和國務卿嘉斯巴里樞機(Card. Gaspari)，及傳信部長王勞松樞機(Gnlielm Van Rossum)詳談，推薦了數位可以擔任主教的中國司鐸。終於 1926 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當時雷神父在大殿參禮，熱淚盈眶，感動非常！

首批中國的國籍主教被任命不久，教宗又委任多位中國主教，而

教廷亦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二十年後教宗庇護十二世建立了中國教會的聖統制，教區主教為正權主教，已不是宗座代牧，而且還有中國的第一位樞機田耕莘主教。可見雷神父的奮鬥終得享顯著的成果。

4.2 益世報

在福傳工作上，雷鳴遠神父積極地拓展新的領域。由於他能說流利的中國話，能寫流暢的中文，有助他跟教友和社會各界溝通交流。在天津服務期間，雷神父時常被邀請向不同的機構團體演講，造成了大眾接受福音的良好環境，但神父認為要使更多中國人接觸福音和認識教會，沒有比辦一份日報更有效。

1912年雷鳴遠神父在天津創刊《廣益錄》，這是中國天主教首份中文週刊，以後改為《益世主日報》。四年以後，在1915年十月又創刊日報《益世報》，是中國天主教的第一份日報，旨在為宣講天主教教義，製造配合天主教精神的社會輿論，內容談及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由於消息準確，言論獨立，以愛國愛教，愛主愛人為出發點，大受讀者歡迎。

從《益世報》的籌備及出版過程中，看到雷神父相當嚴謹：股東只限於中國天主教信友，並依照章程設立董監事會，監察報社的運作。就《益世報》的館址，雷神父主張要設於外國租界外，以免國人誤會《益世報》是受外國支配的報紙。

由於中國政局動盪，《益世報》自創刊以來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數度被逼停刊。天津《益世報》創辦才一年，發生了「老西開車

件」，這事件是因法國駐天津領事強佔中國土地老西開，擴展法租界，引起中國人抗議反對，適逢天主教堂又在該地，當時《益世報》刊出一封致法國領事的信，要求領事放棄其主張。領事向當時的天津主教責問，為甚麼天主教報紙攻擊他？主教遂禁止《益世報》再刊出同類言論，同時把雷神父調離天津，而天津教會亦停止支持《益世報》。在種種限制下，雷神父只好請託好友湯作霖協助，並上書教廷，請教廷下令，准許《益世報》繼續發行。

後來因中國北方的政局紊亂，軍閥割據，奉軍進關後，對《益世報》加以壓力，逮捕總經理劉守榮，報社陷入不景氣。其後奉軍失敗，劉經理獲得自由，再度謀求發展。雷神父於 1927 年再次返回中國，依舊任《益世報》董事和監督，但由於安國離天津很遠，於是神父寫信給劉經理，盡力在全國各地物色適當人選任社論主筆。抗日期間，《益世報》以抗日救國為方針來編報和寫社論，但此刊帶來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省的威嚇，曾於 1934 年七月被迫停刊數月。後來日本佔據華北、華中，《益世報》停刊，中國抗戰勝利後，曾在南京復刊，直至中共佔據了大陸，《益世報》便絕版。

在《益世報》出版的五十年裡，它在中國社會和教會上都肩負重要的角色，譬如在天津《益世報》創刊之時，正值北方成立國會，起草所謂「天壇憲法」，有人倡議憲法中列入以孔教為國教的條文，當時雷神父即邀請佛、道、回等各宗教，組成團體，發表反對宣言，並進北京，向北方政府請願，爭取宗教信仰自由。另袁世凱於 1915 年稱帝，《益世報》不顧停刊的危險，堅決反對帝制。《益世報》創刊的目的就是要宣傳天主教，因此內裡大量刊登有關天主教的文章，當中有些文章是雷神父親自撰寫的，如「天主是誰」、「天主教存在的理

徵」、「天地間之秩序證明天主之實有」等，藉著《益世報》使許多國內文人認識天主教信仰。1933年更闢「宗教與文化」專頁，介紹天主教史人物對中國科學文化發展的貢獻，藉此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

4.3 成立修會及教友團體

教宗庇護十一世在《教會事件》(*Rerum Ecclesiae*)通諭中，提及當考慮在傳教區創立新的修會，就地域與環境的特殊情況，適應本地人的性格與傾向，務求使教會能植根在各地域，不斷擴展。為響應這項號召，雷鳴遠神父於1927年在安國創立「耀漢小兄弟會」，屬於國籍修會，融隱修與顯修生活的理想：在家苦修，出外傳教。最初的動機只為培育協助神職人員的傳教員，後來因應時代需要，把這計劃擴展至修會的成立。修士們除了度修道祈禱的生活外，亦從事各種生產事業，如農業、小型工業，也辦學和開設診所，因為雷神父認為傳福音與救國救人是分不開，救人要救全人，包括肉體和靈魂，所以他以社會工作建設中國，進而使中國人皈依基督。

其後，雷神父又成立「德來小妹妹會」，修會的宗旨跟小兄弟會相似，她們也深入社會，為建國而盡力，尤其在安老與照顧孤兒的工作上。在抗戰期間，兩會在雷神父的領導下，傾盡全力救護傷兵，照顧難民，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除了「耀漢小兄弟會」和「德來小妹妹會」兩個在中國創立的團體，雷鳴遠神父亦在外國創立了兩個團體。他與鮑朗神父(Fr. Bolan)於1927年創立「輔助傳教會」(S.A.M)，嚴格規定自己的會友被派到任

何傳教區以後，便完全歸屬所在傳教區的地方教會，成為本地聖職人員，完全在本地主教權下服務，付出心血和力量。其後在 1937 年，雷神父又與彭師雷小姐(Miss Poncelet)創立「鳴遠小姐服務團」(A.F.I.C.原稱公教國際婦女輔助團)，也根據同一原則及精神為傳教區本地主教服務。

在鳴遠四團體創立之前，雷神父已大力推動教友傳教事業。他在 1911 年正式成立天津公教進行會（初名傳信善會），並在天津教區內紛紛成立許多支部，由教友負起福傳工作，且迅速地推廣到全國其他教區，當時共有十七個教區成立了同樣的組織，統一指揮，定名「中國公教進行會大同盟」，曾於 1914 年在天津召開了首屆大會。以後在剛恆毅主教鼓勵下，日益發展，在教會內成為一股活躍而有作為的新力量。

5. 全真常的精神

雷鳴遠神父不單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功績獨樹一幟，從他的傳記和書信當中，更看到他高尚的品德和愛主愛人的精神。「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是雷鳴遠神父最膾炙人口的修身格言，有人稱之為「修身三格言」或「處世九字訣」，他則以其為「神修綱領」，並以身作則實踐出來，更以「全真常」為其修會的基本精神，強調修會會士應完全獻身於主並真誠為人服務。

「全」，是犧牲。雷鳴遠神父一生嚴守福音所訓示的神貧。他創立耀漢、德來兩個團體，在會名加上「小」字，不僅表示謙虛，也表示神貧。他強調：「天主之外無物」，修會團體不只在物質生活上處處

表現出樸素、甘貧的精神。雷神父進一步說明「全犧牲」的精神是要死於個人的自由意志，即是無我精神，要一心一意侍奉天主，他勉勵其修會團體說：「小兄弟心中所關切的惟一而已：即乃承行主旨，悅樂主心，得天國及其義德」。這精神在雷神父創會前已立下榜樣，就是在聽命中實踐出來。他在爭取任命中國國籍主教的過程中，雖知道自己所作的是合理的，是有助教會在中國的發展；但由於主教和會長的看法不同，禁止他的工作，調換他的職務，並把他調離中國，雷神父含淚堅忍，無聲無怨，接受命令。1921年一月十一日，雷鳴遠神父晉見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談及選任中國第一任國籍主教時，王樞機對雷神父說：

「我從我心的深處感謝你的所作所為的一切，感謝你所遭受的痛苦，感謝你完善的聖願服從，是它拯救了一切！請你注意傾聽：在一個這樣重大的命題（本地主教），如果保衛這一命題的司鐸，他的行為不是絕對的無瑕可指，我們絕對不會支持他……我沒有辦法表示我多麼感謝你對服從的德行有這樣大的信德，使你毫不遲疑的絕對服從！就人事說，你的服從彷彿破壞了一切。不！天主所祝福的正是這一點，你看依恃天主的上智是沒有錯誤的。」（《雷鳴遠神父傳》，366頁）足見王勞松樞機肯定了雷神父忍耐而聽命的崇高價值，使教廷信任他的主張，任命首批中國國籍主教，這就是全犧牲的代價。

「真」，是真愛人。雷神父指出為能真愛人，必需透過愛主之愛而愛人，是無私的愛。他說：「何謂真愛人？時時事事，先人後己。」他愛中國和中國人，從他一到中國傳教，就表現這種愛，努力研習中國學術思想、說中國話、用毛筆寫中國字，作個完全的中國人，與中國人一條心，無論在那個鄉鎮的本堂服務，都盡心愛護當地人民。

1901年七月十三日，雷鳴遠神父從北京給胞弟伯達寫信說：「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什麼，像愛中國民族一樣，我愛外教人像愛教友一樣，就是這個使我感到榮幸。當我同修士們在一起，用我不合語法的一點兒中國話跟他們交談，勉力開始我的傳教生活，那時我比聖保祿在天堂更幸福。小弟弟，我的聖召多美好啊！多美好啊！幫助我感謝天主賜給了這恩惠！」（《雷鳴遠神父書信集》，31頁）儘管他被調回巴黎，也盡力照顧留學巴黎的中國學生。最後在中日抗戰的時期裡，雷神父更發揮了無限的愛心，救護傷民，保護百姓。

「常」，是常喜樂；是雷神父生活的秘訣，也是他成功的秘訣。雷神父要兄弟們時時喜樂，他認為他的修士，人人都應該成聖，而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常喜樂。真正的喜樂是在天主之內，當與天主永遠結合。雷神父指出喜樂是來自意志的，我們可以使自己喜樂或悲傷，他說：「天主借近人的手給我送來一點不合適，一點困難？我可以高興的接受，毫不猶疑的感謝天主。保住我們的快樂，不必向人怨尤.....只要我們有一個乾淨的良心，什麼也阻不住我們喜樂。」（《雷鳴遠神父傳》，434頁）雷神父的一生，可以說常是在苦難和紛擾中，然而他的內心總是平和的。他創「耀漢小兄弟會」在安國的總院，定名「真福院」，是取於山中聖訓的真福八端，承行主旨，自然有真正的喜樂。

于斌樞機在雷神父逝世六周年時講了「雷鳴遠神父的三不朽」，其中提到雷神父的「全真常」說：「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犧牲不難，難在一個全字；愛人也不難，難在一個真字；喜樂也容易，但常喜樂就不太簡單。犧牲為愛人的表現，愛人為喜樂的基礎，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是有連帶性的一套修養方法。」雷神父以身教，

不只教導他的會士作個全真常的人，也給教內教外人士立下修身處世的榜樣。

6. 總結

由上述各項事件，可以看到雷神父的理想和努力是多層面的，然而在眾多的工作中，最大的貢獻是他加速了中國教會本地化，影響至今，稱頌景仰他的人多不勝數，他的貢獻是獲得教會肯定。最後本文以1977年雷神父百歲誕辰紀念日，傳信部致函給四個由雷神父創立的團體，信中的話語作結：

「真可以說：是雷神父的傳教熱忱，促使他全心熱愛中國。從1910年到1940年，他毫無保留地獻身中國，任何困難和打擊，都不能阻止他，為他所景仰而具有悠久文化的中華民族，宣揚基督。他為使中國知識份子容易接受福音，他使自己的生活深入中國文化，他和藹可親的風度，使人容易接近他，向他開放心靈。當他說：『與中國人在一起，就中國化』的時候，中國人對他感到多麼親切和信任。」

參考資料

1. 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臺灣：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1990。
2. 趙雅博，《雷鳴遠與中國》，臺灣：衛道中學，1985。
3. 曹立珊，《春風十年》，臺灣：聖化月刊社，1977。
4. 穆啓蒙著，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台北：光啓出版社，1992年四版。

5. 劉家駒，「雷鳴遠與利瑪竇」，《神學年刊》n7，香港：聖神修院神學部，1983，57-64。
6. 曹立珊，「雷鳴遠神父對修會教育的貢獻」，《神學論集》n87，台北：光啓出版社，1991，35-47。
7. 宋稚青，「雷鳴遠神父與天津益世報」，《神學論集》n87，台北：光啓出版社，1991，49-62。
8. 狄剛，「漫談雷鳴遠神父的教會觀」，《神學論集》n82，台北：光啓出版社，1989，489-505。
9. 董立，「雷鳴遠神父與中國本地化」，《神學論集》n103，台北：光啓出版社，1995，79-95。
10. 羅光（雷鳴遠神父叢書編輯組），「雷鳴遠神父在中國天主教的地位」《雷鳴遠神父專刊第一集》，臺灣：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1990，23-30。
11. 若塞（雷鳴遠神父叢書編輯組），「一位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先驅」《雷鳴遠神父專刊第一集》，臺灣：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1990，30-32。